

铁岭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(内部发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辽宁省铁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铁岭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(内部发行)

政协辽宁省铁岭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本辑编委会：主编 王国兴

编 辑：左鸿儒 李玉奎 马士杰 王 群 卢 骅

封面设计：邱景山 全石刻印：高彦鲜

铁岭日报社印刷厂 1985年12月印刷

印数：3,000册 工本费0.99元

前 言

《铁岭文史资料》第一辑在市政协成立一周年之际，与读者见面了。

文史资料的征集、编撰、出版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、大统一，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大事。本书遵循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以各方面各界人士亲历、亲闻、亲见的独特形式，介绍了与我市有关的中国近、现代史部分资料。本书愿为铁岭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，为我市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服务。

本书在编撰过程中，得到市及各县党史征集办、地方志办，市地名办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及铁岭日报社印刷厂的大力支持，得到各县、区政协的真诚协作。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端木蕻良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，我市著名书法家高澄鲜同志为本书篆刻金印。在此谨表谢意。

铁岭市地处辽北平原，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，在近、现代史上占有一定地位，不乏可以撰写的资料，在此，我们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。

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之经验不足，书中肯定会有失误或不妥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铁岭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十月

目 录

回忆家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.....	高存信 (1)
高崇民同志的家世及其他.....	卢 骅 (55)
苏俄红军“中国团”团长任辅臣烈士的事迹.....	任光伟 (66)
薄一波同志对“高尔华传略”一稿的批示.....	(81)
回忆妹妹高尔华同志.....	高鸿羽口述 卢骅整理 (82)
锡伯族共产主义战士关俊彦.....	端木旋林 (92)
朱承泽同志传略.....	卢 骅 (108)
许芝烈士传略.....	韩 庸 (113)
抗日联军三师在西丰.....	于春海 (123)
抗日志士白子峰.....	刘惠民整理 (133)
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康平县.....	华子扬 (141)
铁岭火力织布株式会社工人的罢工.....	刘仲奇 (161)
“七五”学生运动的前前后后.....	吕振洲 (163)
我们所知道的吴俊升.....	刘仲奇整理 (173)
热察特别站成立始末和马汗三之死.....	<u>康健东</u> (182)

回忆家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

高 存 信

爱国将领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。它结束了十年内战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，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，实现了全民抗日。

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六一年，号召曾经参与西安事变的同志们撰写回忆录，以便搜集整理有关这一事变的史料。很多同志响应号召，写出大量的回忆文章，一些单位还搜集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；对于研究西安事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家父高崇民是参与西安事变策划者之一，西安事变时家父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委员（注）和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参加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某些机密活动，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家父生前曾把他往事比喻为“雪泥鸿爪”。我现在借此为题，把他在西安事变前后那个严酷岁月里的活动记录下来。里边所涉及的史实，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，有的是根据家父生前谈到的，还有一些是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们提供的，经综合整理，写成这篇回忆录，供研究史料的同志们参考，倘有舛误，请指正。

（注）见《解放日报》民国十六年一月五日一版，所刊登的“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委会，昨举行第三次纪念周，吴秘书长报告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京近况，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参谋长董英斌，秘书长吴家象，委员有高崇民、郭维城、宋绮云等”。

一、西安事变前

(一) 在迷惘中见到光明。

家父生活在灾难深重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、侵略，使他在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。然而在他没有找到共产党以前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十几年来“太瞎摸海了”，他为抗日救亡奔波呼号，却连遭挫折。早在一九二三年，他曾因为反对日本续租旅大，而被驱逐出奉天省（即辽宁省）境，一九二七年又因与哈尔滨市政当局发生矛盾，被指控为共产党而遭拘捕，因查无实据，被押回奉天原籍。一九二九年他一度做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、张学良的秘书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东北军撤退关内，沈阳被日军占领，家父于九月二十四日进关内。到北平见张学良时，问张为什么不抵抗？张回答：“有中央的命令，不让东北事件扩大，一切听从政府”。这种不抵抗的政策，使东北三省很快地被日寇全部占领。家父万分愤慨，决心不做官、不经商，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。家父把这个想法对张学良讲了，要求张在经济上支援他，张将军表示每月可以给他三百元生活费。九月二十七日他与先后来北平的阎宝航、杜重远、车向忱、卢广绩、陈先舟、王化一、王卓然等，组织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，同时筹划组建东北义勇军。一九三三年热河失守，蒋介石以张学良为替罪羊，逼张下野出洋，由亲日派何应钦接替北平军分会主任职务。不久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被何应钦查封，家父等又秘密组织了“复东会”，又被蒋介石探知，逼张学良取消“复东会”，与他合组“四维协会”，并派复兴社人员入会，

对该会进行控制。一九三三年五月，蒋介石与日寇签定了卖国的《塘沽协定》。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、热河，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。一九三五年六月，蒋政权又连续与日寇签定了《何梅协定》和《秦土协定》，把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大部主权奉送给日本。日寇还酝酿“华北五省自治”企图成立“华北国”。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又秘密接受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“广田三原则”（注）企图引狼入室，出卖全中国。中华民族危亡已到了紧急关头。一九三五年六月间，在武汉“四维学会”的座谈会上，家父发言说，蒋介石若不抗日，我们东北人就不能拥护他做领袖，因此和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——贺衷寒发生争吵，拂袖退出会场，遭到蒋政权的通缉。他从武汉秘密去上海，潜居在公共租界内。目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，专门压制国内人民的抗日活动，此时精神上极度苦闷。

杜重远当时在上海主编《新生》周刊。因刊登“闲话皇帝”一文被判刑一年零二个月，监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。共产党员孙达生同志（注）是重远好友，不时去看望重远，常常交谈联合抗日等问题，重远把家父介绍给达生同志，达生同志与家父之间过往甚密，共同研究革命救国之路。家父开始研读进步书籍，如《列宁传》、《马克思传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两个策略》等重新确立世界观，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。

（注）广田三原则：一不许中国民众用任何形式（从武装抗日一直到抵制日货）来反对日本。同时还要使中国政府完全亲日；二要南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，与满洲国建立邦交；三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共同联合进攻中国的苏区和红军。

家父是信仰三民主义的，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，他参加了国民党。达生同志针对他的思想，有意识地向他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，向他指明三民主义的空想性，对他进行阶级分析的教育，指出蒋介石已变成为买办阶级、封建军阀的代表，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，只有共产党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，它当前的政策是团结各方面共同反蒋抗日，对内实行民主政治，改善人民生活，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如苏联等等。共产党信仰科学共产主义，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的新国家。要发动全民抗战收复东北，只能指望共产党的领导，等等。

家父经过多年的救亡活动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，不断碰壁，经历过许多挫折，直到四十多岁时，通过达生同志的启蒙引导接受了革命理论，了解到只有共产党，才是真心领导抗日救中国的，认识到蒋介石已成为孙文主义的叛徒，他毅然决然地销毁了国民党党证，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。家父对达生同志的印象很好，他经常对我说“那时在上海，达生同志朝夕为我讲解革命道理，论年令他是我的老弟（达生同志比家父小二十岁），论马列主义水平，他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使我十几年来，迷惘的思想豁然开朗，透出一线光明”。甚至在“文革”期同达生同志蒙冤挨整时，家父也敢于如实地称赞孙是他学马列的“启蒙教师”，家父认为：后来东北军之走上联共抗日道路，孙达生尽了他应尽的努力，他是东北军地下党员中突出的一个。

一九三五年暑假期间，我在上海家父处，经常遇见达生同志与家父谈论问题。我听到他讲解一些革命道理，如“今日中国向何处去”，“为什么社会上穷人那么穷？富人那么

富？”有时，晚上我们在街上散步，不时地看到乞丐和妓女，达生同志联系实际，向我说明中国旧社会的黑暗，贫富的悬殊，使我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启发。当时家父曾嘱咐我说：“你在中央军校学习，那里政治很复杂，绝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派别组织，他们表面上说是‘复兴中华民族’‘救国’等等，实际上都是为争权夺利。咱们东北人，一定要时时不忘收复失地，打回老家去，不能长期当亡国奴”。他给我两本他所著的书，一本是《东北魂》，说明蒋介石不要东北，东北人一定要下决心收复东北；一本是《中国国民党正义》，中心思想是批评国民党执行的“先安内后攘外”的政策，要求实行孙先生的联俄联共，扶助农工的政策。同时他向我讲到马克思、列宁都是伟大的人物，列宁在俄国把社会主义革命搞成功了。由此引起了我也想了解马克思和列宁，回到军校后，设法借来了《马克思传》、《列宁传》进行阅读，使我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。

（注）孙达生原名宋介农，在西安时化名孙万发。吉林省双辽人，一九一一年生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逃关，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，现为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东北军党史组。

（二）接受党交给的第一个任务

一九三四年春，张学良从意大利归国。他为了重掌东北军，拥护蒋介石为中国最高领袖，以换取蒋介石支持他收复失地，重整山河。一九三四年夏天，蒋任命张学良为豫、鄂、皖“剿总”副司令。秋天，在豫、鄂、皖“剿共”中东北军的一一五师受挫，蒋不给东北军整补。这时张对打内战，思想上产生疑虑。张找了许多东北元老谈话，征求意见。一九三五年春，家父曾到武汉徐家棚，向学良谈抗日救国的问

题，坚决主张东北军不应参加打内战，否则将在内战中消耗殆尽。张学良也曾想过退出内战，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，但当时张对于中国共产党尚无正确认识，并没有联共的思想。他顾虑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，失掉经济来源，不出三个月，就要颓垮。后来，张学良听马占山和李杜叙述，他们从黑龙江退出东北，途经苏联时，斯大林应允援助中国抗日。因此张又想通过中共中央向苏联求援。一九三五年六月，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调往陕甘“剿共”。家父和杜重远把东北军的调动和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告诉了孙达生。孙当时即向在上海的党组织先是江苏省委后是中央文委汇报，经研究后，认为东北军张学良很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，实行民主、抗日至个条件下的联合对象，应争取与其联合，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；东北军、西北军、红军如果能联合一致反蒋抗日，以大西北为根据地，则不仅解了党中央和红军之围，还可以联合苏联、外蒙便于进军华北抗日，将是中国政局的一大转机，应抓紧通过杜重远和高崇民开展东北军的工作。根据党的这个指示，达生同志提出他与家父到西北去的建议，家父立即同意，决定冒着受通缉的危险前去西北。同时杜重远建议东北军到西北后，首先应和杨虎城联合，他与西北人士有些交往，可以推动，并当即写了介绍信，介绍家父和孙达生与杨虎城、杜斌丞联系。家父与孙达生约定，到西北后家父主要在上层开展工作，孙达生做秘密工作，互相配合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初，东北军的一一〇师在甘泉县大、小崂山战役中，被红军全部歼灭。孙达生与家父商议决定分别去西安。十月下旬家父路过南京，与阎宝航会面说明去西北从事东北军、西北军、红军联合抗日的计划。阎是张学良派

驻南京观察动静的耳目，他对蒋介石放弃东北，又在华北对日退让，华北将变成第二个“满洲国”的危险，以及疯狂剿杀红军，镇压人民抗日的内幕知之较详。家父与阎会谈后，洪宝与阎同返上海，去狱中与杜重远进一步协商，并联名向张写了建议书，大意是：“不能对蒋抱幻想，不能继续打红军，消耗实力，而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抗日运动逐渐被镇压下去，日本的势力日趋巩固，不能再等待，现在东北军集中到西北，有利于整训部队，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，对外联合苏联、外蒙，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的机会到了”。家父带了建议书再一次动身，经天津、北平与陈先舟、刘兴沛计议，又密访天津、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同志王梓木等，研究去西安怎样开展工作的方法之后，由胡圣一陪同前往西安，这是家父找到党后接受党交给的第一个任务。

（三）到西安后的活动

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家父到达西安。时值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届全代会。家父持杜重远的信，结识了杜斌丞同志，并经杜引见会晤了杨虎城将军，转交了杜重远的信。家父讲述了杜重远在狱中的情况，又谈了对当前政局的见解，阐述了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，蒋介石却顽固坚持“先安内后攘外”的反动政策，自相残杀，祸国殃民。他们彼此交谈比较融洽。

这个时期，家父接受了党提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思想，就在东北军中秘密宣传这种思想。有一次王以哲将军到西北饭店来看望家父，副官刘宗汉随之同来，王以哲问明家父此次来意之后，说：“我若不是军人，我情愿同你一道搞救亡工作”。家父说：“你的作用大有可为！你有人、

有马、有枪，就看你怎么干！”王说：“你知道，有人劝我去说服张副司令（海陆空军副司令）保住实力，独立自主，联合北方友军（红军）联合民众救亡团体，组成抗日联军，摆脱蒋介石，打到哪，算到哪！我倒很想这样干，可是怎么个干法？经费也是个大问题”。王以哲深悔“九·一八”时他盲目服从，一枪不发地丢掉了沈阳，对不起东北父老。他悔恨自己过去的无知，成为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。在张学良归国后，他曾一再建议，别再听蒋介石的那一套，坚决主张东北事应由东北人自己来决定”。

家父说：“东北军是东北的军队，在自己的家乡本土组织起来的，有他自己的任务，有他自己的立场。东北军丢掉了东北，东北军再去拿回东北，这是全国老百姓所欢迎的，但是有一条，不拒绝服从老蒋的命令，东北军就没有打日本的权利”。王说：“等‘剿共’完了再行抗日，则抗日将永无实现之期”，“实在不应再上蒋介石的当了”！

他们俩人谈到蒋介石一贯排斥、歧视所有杂牌队伍，东北军要避免被消灭，出路只有一条：不为蒋介石所利用，避免打内战，保存实力，等待时机。

家父在东北军的军官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，对于过去的熟人、朋友、同乡，就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的思想，有许多不相识的军官，他也想方设法结识他们。如独立炮兵团团长刘佩韦，以前家父跟他不相识，他了解到刘的夫人富毓智（现名富平）是开原县人后，在一九三六年春的一天，家父到七贤庄一号刘团长家，毛遂自荐地说：“我叫高崇民，是辽宁省开原县人”，因为是老乡，彼此都感到格外亲切。家父就向刘团长宣传抗日的道理。他说：“我们东北

军肩负着打回老家去的责任，军队是应该抗日的，军人应效命于抗日的疆场，不应该打内战”。家父认为高福源这方面感受很深，思想比较进步，就介绍刘佩韦和高福源见面，扩大高福源的影响。

家父到西安不久，孙达生同志也来到西安，那时家父已经搬到了西安双仁府八号居住，达生来后，即住在家父家中开展工作。东北军中人员情况复杂，他们必须区别对待，对有些人只能谈抗日，打回老家去；对思想进步的一些人就可以谈联共联苏，如王以哲、赵国屏、刘多荃等，对比较知心的栗又文等人家父干脆告诉他：“我左倾了”。象苗剑秋等人也能谈联共抗日的问题，但是观点上有很多分歧，如联合红军和共产党，他们认为“红军力量小，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，是为了争领导权，拿抗日作手段。只有东北军抗日打回老家去，是真诚的，是主力，号召力大。”他们认为“国民党不领导抗日，共产党领导不了抗日，只有东北军能领导抗日”。苗剑秋则更放肆地抨击谩骂共产党，说：“联合共产党，得在我们领导下，红军就范，不捣乱才行”。对于苗剑秋等人的这些言论表现，达生同志和家父经常秘密研究，尔后多由家父出面，讲反蒋抗日，建立三位一体等重大意义。

（四）与张学良将军一席谈

家父到西安时正是直罗镇战役进行的时候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，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，在直罗镇把东北军的一〇九师全部歼灭，师长牛元峰战死。张学良在南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非常震惊。蒋介石跟他讲，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途奔波，到陕北以后所剩无几，只要集中力量不出二、三个月就可以把疲惫不堪

的红军全部歼灭。可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，调到西北战场，^①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，经过崂山战役，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等三个战役，便损失了将近三个师，这样下去不要多久，东北军将被消灭在内战战场上，使张学良万分痛心，而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，不但不介意，反而要取消在崂山战役中被红军歼灭的一一〇师的番号，^②张将军从实践中渐渐地看透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，他感到“剿共”是剿不了的，也是剿不得的，事实证明，不但打不了共产党，反而毁了自己的部队。认识到他受了蒋介石的欺骗，“不抵抗”、“先安内后攘外”，使他丢了东北，离开了华北，国难家仇不能报，还担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，他感到跟蒋介石走下去是一条死路，可是他不跟蒋介石走又怎么办呢？跟共产党联合，共产党能不能跟他联合？开始他顾虑重重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，消除了张将军的顾虑。张将军思想上转变，是主客观多种原因，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，多方面进行工作的结果。绝不是某个人说服的结果。而起主导作用的是张将军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思想。

张学良将军由南京回西安后，知家父曾与贺衷寒闹翻被通缉，此来必有要事，于是单独接见了。家父先把他和杜重远、阎宝航写的建议书交给张，表达了东北上层人士对东北军的关心，接着直言不讳地说：“蒋介石派东北军‘剿共’是一个阴谋，意在两败俱伤，伤哪一边都是蒋介石的胜利。共产党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要建立一个象苏联那样的新型国家，是从穷苦老百姓利益出发的，所以红军到什么地方都得到人民的拥护，按道理是不应该‘剿’的，按力量也是‘剿’不了的。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都消灭净尽。反之，所

谓国军都在明处，一举一动，红军从老百姓口中知道的最清楚，因此红军行动很自由，要打就打，要走就走，可以以少击众。况且现在红军北上抗日，副司令和东北军失掉东北故乡，不思设法收复东北失地，而连年跟着蒋介石打内战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士气当然不振，只仗恃我们武器比较精良是不能战胜红军的，大、小崂山和直罗镇战役证实了这一点，副司令应权衡轻重，斟酌利害，是保存东北军实力，收复东北老家呢？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？”家父这一席话正说到张将军的思想痛处，当时张在表面上虽对家父直说未置可否，但很高兴。张将赵媿小姐唤出，三人共进午餐，边说边谈。张说：“我们如不剿共，怎能抗日呢？”家父向张将军建议：应当与共产党联合，也应当跟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，共同抗日，只有国内大联合，才能驱除日寇，收东北失地。

（五）为张、杨联合奔走

十七路军素有进步之名，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，与蒋介石有矛盾。达生来西安前，驻天津的中共军委特科的南汉宸同志，把杨的情况曾向达生作了介绍，希望他和家父做两军的联合工作。东北军到西北之初，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并不融洽，下级军官士兵，在争房子、看剧等小事上经常发生争执。特别是蒋介石怕张、杨真正合作，不好控制，于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。蒋对张学良说“只要东北军‘剿共’能立功，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”。他又派戴笠跟杨虎城说：“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，要杨注意！”加之十七路军和杨虎城将军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将军还不怎么了解，所以产生一些误会。家父和孙达生到西安后，即按照党的意见积极开展促进张、杨联合，促进他们与红军联合的工作，并提出

以陕甘为后方。他们这些意见都曾写在《活路》的文章中，张学良看后曾明白的表示，不同意以陕甘为后方的提法。他曾说：“咱们东北人流亡在外，要有骨气，不抢人的地盘，我们要抗日，随时拍拍屁股，尘土不沾就走”。这说明张初来西北根本不想在西北久留，也没有长期打算，经过家父的多次解释，并把杨的反蒋联共的历史情况告诉了张，他才逐渐转变。特别是当他感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必须联合起来才能联共抗日的时候，才积极努力加强团结的工作。张召家父谈话，告以西北军对东北军如何发生误会，他曾先后派黎天才、张潜华去作解释，反使误会加深。他希望家父担负起消除误会的工作。他对家父说：“解除误会方能成大事，你可以坦率地向杨虎城说，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，也不至不肖到这种程度，失掉自己的家乡，来占人家的地盘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从意大利回国以来，只认为国家必须统一，集中全国力量才能抗日，不料事与愿违，我内心实有说不出的苦痛”。

家父见张如此诚心，非常高兴。他再次到新城大楼同杨虎城会见，他披肝沥胆，痛切陈述张的深谋远虑，言明张对西北绝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，毫无顾虑地指出蒋介石命东北军“剿共”的阴谋，并揭露蒋介石唯恐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密切合作，有意地制造谣言进行挑拨离间，以致彼此发生误会，等等。他去建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停止剿共，一致对外，把西北、西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，走向共同抗日的道路，才是国家之福，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。杨虎城听了家父的谈话，觉得爽直诚恳，有政治见解，当即表示愿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，从事抗日救国工作。

家父把同杨虎城谈话的情形告诉张学良，张也很满意，说以后要多多同杨和十七路军方面的上层人物接近。过了几天，杨虎城将军、杜斌丞等约家父到三原东里堡杨的别墅，特介绍孙蔚如、赵寿山、申伯纯等上层人士与家父恳谈，并要他们以后密切联系，此间先后来西安的刘澜波、卢广绩、李向忱、栗又文等抗日积极分子经常在家父家中约集东北军、西北军的中、上层人士，研究联共抗日等工作。中共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党人阎揆要、赵寿山、杨明轩、徐彬如、王炳南、宋绮云，申伯纯等都作了许多推动两军团结的工作，使两军上层的关系愈来愈密切。

两军的正式联系，开始是通过家父、孙达生与西北军的申伯纯、金敏生（宪兵营长）进行的。以后张学良又让增加栗又文、应德田、孙铭久，开联席会，互通声气。杨虎城方面也增加了王菊人、蒲子正。他们开过二、三次联席会。在联席会上申伯纯、金敏生、王菊人等对南京的动态，国民党特务的活动，中央军的调动情况，策划向西北进军，国民党编造谣言，谎报军情以及杨主任的希望、想法等介绍的比较多。而应德田等认为十七路军是西北人，受国民党的挑拨不完全可靠。在张、杨指定的联席会上，应德田与孙铭久很少主动提问题，有时传达一下张学良的意见，主要是观察动静向张汇报。

张、杨彼此之间已了解对方是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。终于联合起来了。一九三六年四月份，张学良想要直接与杨虎城面谈。遂通知家父陪同杨虎城来他的住地洛川。时值杨虎城欲去榆林为井岳秀奔丧，张学良派他的波音飞机接送杨虎城去榆林。借此机会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直接进行有家父参加的秘密会谈。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共产党红军三方